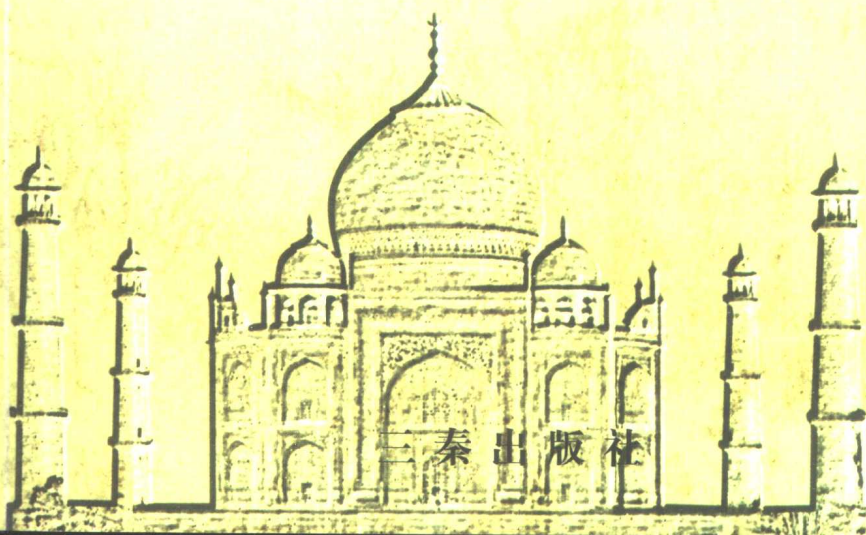


世界帝国兴衰丛书

莫卧儿

帝国

尚劝余
著



秦出版社

世界帝国兴衰丛书

莫卧儿

帝国

尚劝余
著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卧儿帝国/尚劝余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10
世界帝国兴衰丛书
ISBN 7-80628-509-1

I. 莫… II. 尚… III. 莫卧儿帝国(1526~1857) - 历史
IV. K35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653 号

世界帝国兴衰丛书

莫卧儿帝国

尚劝余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长安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509-1/K·206
定 价 13.00元



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

—《世界帝国兴衰丛书》总序

彭树智

三秦出版社筹划已久的《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即将陆续面世。责任编辑陈景群同志约我为这套丛书写篇总序。我考虑到参与过筹划工作，同时对这个选题寄予厚望，所以乐于写一些有关帝国的历史和文明交往问题之所得，作为各卷前的叙意，进而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

世界帝国史是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世界性的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世界帝国史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专门性大课题。要深入了解世界历史，不可不了解世界帝国的兴衰荣辱史。

如果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首先就应当以



世界帝国的兴衰史为鉴。因为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其历史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历史经验教训更有普遍性，所以其借鉴性也就特别强。

如果说，学史可以使人明智，那首先就应当学习极富思考空间的世界帝国史。因为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都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都成为增长人类智慧、开掘理性启示的用之不尽的珍贵宝藏。

如果说，学史可以培养世界意识、拓宽全球视野，那首先就应当学习各个世界性大帝国的历史。因为“国情”和“世情”是相比较而存在，悠久的中华帝国史和同时期的世界性大帝国史，同为世界历史的不同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同”、“异”合流的长河中，方能找准民族性的位置，识破历史的真面目。

二

读史者对世界帝国史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政治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政治史始终处于世界帝国史的中心位置。帝国的兴衰，集中表现于政治上。

帝国政治史是资治的镜子，是政治家们关注的热点。历来的治帝国史者大多都为此把政治借鉴放在首位。李维（Titus Livy，公元前 59—公元 17 年）在巨著



《罗马史》中，就明确指出：“研究历史的特有效果就是能在历史真相的启迪下，看出各种类型例证，从中为自己、为国家选择可以效法的榜样，以及应予避免的、始而有害、终成灾难的覆辙。”

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 204 - 前 122 年），这位希腊罗马史学交融的杰出代表，在其巨著《通史》中明确主张“以史为鉴”。他指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历史不仅是人类业已完成的伟大成就，而且是人类行动的指南。当代人的言行，往往为适应形势需要而加以掩饰，惟有历史才能为政治家提供前车之鉴，提供批判周围环境和人的行为动机的实例，教会人们区别敌人与诤友。他把人类的改革分为两条道路：一条是亲身经历祸乱之后而进行的改革；另一条是以他人失误为戒而进行的改革。他认为，政治家不应选择前一条道路，因为这会使改革充满困难和危险；而应当坚决选择后一条道路，因为这是不遭受损失的最佳选择方案。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有见解的观点。

然而，政治虽有其独立形态，它毕竟是奠基于社会经济根基之上。读史者从世界帝国史的政治变迁中，必然会发现政治本身不是孤立的，它不可能不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经济是世界帝国赖以生存的立足点，没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稳定昌盛。只有从世界帝国社会生活的深处，才能透彻地观察到政治与经济在一种社会形态中的结合点。



三

文明或者文化，是世界帝国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正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于能够创造文明或文化一样，作为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产物的世界帝国，对后世带来最有长远价值的，就在于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不同世界帝国的文明，体现着不同帝国的自身特征。

只有从文明的特征上了解世界帝国，才能从根本上深刻地理解世界帝国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的大帝国——波斯帝国，就是以文明为特征而凸现于人类文明史之上的。它不仅有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有维系庞大帝国和管理庞大帝国的制度文明（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等），因而比之埃及和亚述帝国，在文明内涵方面更成熟、更丰富、更深刻。尤其是波斯帝国包括了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三大古文明中心，并且接近了第四个古文明中心——希腊的边缘。

世界帝国的兴衰，战争的征伐，一切政治上震慑人群的事功，诸多制度上的频繁更迭，其影响固然可以显



赫一时，但从历史的观点看，只不过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反观文明的伟大创造，则以各种方式，或传承，或演化，从而融入世界文明的总体之中，长存不衰。

追忆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三大文明标志便突出地显示出其创造性的位置。为西方文明做出伟大奉献的《市民法》和《万民法》，成为古罗马帝国文明的首要标志。第二个标志是卡图卢斯和维吉尔这两位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特别是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堪称不朽杰作。但丁在其名著《神曲》中，把维吉尔作为自己从地狱和炼狱到天国门口的向导，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多才多智的西塞罗，成为第三个标志，他提出的“理性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无疑是共同的”哲理，对于人类文明史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文明成为古罗马史的基础。

世界帝国的有作为的大帝、皇帝、君王，确实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其影响更久长，甚至是不朽的。

或者说，世界帝国的杰出统治者们之所以对后世有更大影响，不仅在于他们的武功，而更重要在于他们的文治。

阿拉伯帝国杰出的哈里发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都以不分宗教畛域、不拘意识形态差异，而一律尊重知识、奖掖学术。特别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麦蒙，在首都巴格达创办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三位一体的智慧馆，任命景教学者和翻译家侯赛因·伊本·



易斯哈格为馆长。麦蒙按译稿的同等重量的黄金，重奖易斯哈格的译稿，可谓空前绝后的高翻译稿酬。实际上，不仅阿拔斯王朝的杰出的哈里发们，不仅该王朝的一些地方统治者，而且在西班牙立国的后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们，也都因为热心扶持帝国文明而闻名于后世。正由于他们的倡导，使巴格达、开罗和科尔瓦多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并从这三大中心向全世界放射出绚丽的文明光彩。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把那些创造世界文明的人们，誉为“以心而伟大的英雄”，并指出只有他们才是推进文明、延泽后世的伟人。

有多少人能记得徒具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然而集二十年之功而成书的《神曲》，却堪称文明时序交往的桥梁和连结近代与古代世界的传世之作。但丁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名言，启迪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去清醒地面对现实的“地狱”、勇敢地迎接“炼狱”的苦斗，从而达到理想“天国”的理性追求。

有多少人去理会英国的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这位前所未有的伟大剧作家，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他的悲剧《李尔王》、《朱利叶斯·凯撒》等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是创造性的，而且在创作主题上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高尚人物性格与人类有生俱来的罪恶及其自我毁灭的本能之间的冲突。他那强烈充满人性、以至使人文主义淡化在背景中的戏剧，他那艺术超



越教条而反映生活真实的戏剧，将永存人间。

谁能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帝王们？然而作为诗人与哲人的歌德，不仅以追求知识和人生真谛的名著《浮士德》而流芳百世，而且由于热爱中华文明而获得“魏玛孔夫子”的雅号。文学是文化交往的纽带。各民族通过文学来接触其他民族，彼此就会有更好的了解。令人不能忘却的，是歌德已从中国和德国之间文明交往过程中，预见到人类由“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的前景，并且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预言。

歌德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它泛指“文明”或“文化”，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交往时代多元化的整体精神文明。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广义名词，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写入《共产党宣言》之中，从而成为世界文明普遍交往的新术语。

四

世界帝国的特性在于文明。不同的文明构成了不同世界帝国的不同风貌。

世界帝国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使不同帝国的文明兴盛，交往也使不同帝国的文明衰亡。

因此，文明交往是理解世界性大帝国盛衰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



实际上，每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盛衰史，都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大历史个案。

人类文明在交往中发生、发展，世界性的大帝国是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产物。

交往活动本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就不能产生文明。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类的社会交往，所以只有社会上的相互往来，人与人之间的广泛接触，才能通过地区、民族、国家而扩大文明交往。

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后期，人类原始公社的各自孤立状态，首先在西亚两河流域突破，出现了居民密集的聚落，诞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小国。稍后，具有此种文明重要标志的国家，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爱琴海等地区，都先后诞生。

但是，真正出现世界性的大帝国，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形成的埃及帝国。它的版图已地跨西亚北非，它用征服的战争交往方式，创造了奴隶制帝国文明。到公元前1000年前期，在西亚形成的亚述帝国，第一次囊括了两河流域和埃及两大文明地区。再到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在西亚兴起的波斯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史上，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波斯帝国既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又开启了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先河。波斯帝国起了古代帝国文明交往史的承前



启后的作用。

文明交往使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成各个统一的帝国和各个帝国彼此对峙的局面。

各个时期诸帝国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交往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各个大帝国成了文明交往的更大中心。它们分地段而又互相连接地打通世界文明交往的孔道。

古代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华帝国、波斯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萨珊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埃及等帝国的文明交往的大动脉。

这条文明交往大动脉，是各个帝国活动的大舞台。为了开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各大帝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交往。战争的交往形式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文明交往从西方的爱琴海通到东方的印度河流域，促使这个广大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3世纪蒙古军队穿越亚欧大陆，建立了世界性的大帝国，东西方陆上文明交往的大道因此而大开。这种突破性作用，是和平交往方式所不能达到的。

伴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交往的开展，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世界性大帝国——殖民帝国。海上新航路的开拓和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的发展，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推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这些帝国虽各具特色，但都是以扩张性的西方文明为其共同点。东方的日本帝国，虽具本国文明传统，但所走的却是西方文明之路。众所周知，“脱亚入欧”曾经是日本帝国的重要目标。

在这些殖民帝国中，英帝国或不列颠帝国是他们中的辉煌代表。500多年来，这个被其创造者和继承人称为“永不衰落的”殖民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在身高只有1.55米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地图上凡是涂着粉红色的地方，都是不列颠帝国的地盘。粉红色遍布各大洲，溅洒各大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列颠帝国总面积为1270万平方哩，其中联合王国占12.1万平方哩，即不到百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列颠帝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都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这种疯狂扩张的程度，真可谓达到了世界帝国文明史上的顶峰。

以不列颠帝国为代表的殖民帝国，按内容属现代工业文明。这个类型的帝国把工业文明传播到全世界。文明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科学的进步，交通、通讯设备的日益发达，推动着西方文明以惊人的速度兴盛，又同样以惊人的速度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它同时也埋葬了各个殖民帝国所奉行的教条：经常扩大“生存空间”和统治尽可能的大陆领地或海外领地，以维持国家的力量和未来。

西方文明及其体现者殖民帝国之所以如此快的衰



落，其原因正如它迅速兴盛一样，是文明交往所带来的全球化普遍的结果。殖民帝国把孤立的民族或国家带进了世界性的互相交往的大环境之中，使他们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使他们越来越主动地探索着改善他们的命运。新的交往手段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思想、组织形式迅猛传播，全球力量正在改变着文明中心和边缘地区的旧交往格局。殖民帝国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

英国政治家沃尔特·白哲特说过，罗马与英国的衰落，都在于他们不理解他们所创造的制度。创造了帝国文明而不了解这种文明交往带来的后果，这正是一切帝国的历史悲剧所在。

五

文明交往对帝国的兴衰如此重要，其根源在于它经常起作用的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民族因素。任何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都是由一个统治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帝国。帝国的兴盛似乎是对新民族的不断征服与奴役，但民族压迫已经埋藏着帝国衰亡的种子。

尤其一些多民族的帝国，由于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矛盾，导致帝国统治者的罪恶遗产遗患无穷，至今世界上还在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他们那个时代的罪恶，并没有因帝国的崩溃而终止。从巴尔干到非洲，从高加索到亚



洲的南端，民族战争和民族屠杀层出不穷。

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分别统治了 12 个民族。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达 100 多个。“日不落”的不列颠帝国更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它埋下的冲突遍及全球，巴勒斯坦就是英国托管政策的产物。它唆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互相争斗，然后便溜之大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势不两立，也是英国在撤退时造成的。这两个国家在 1998 年春甚至以核武器相威胁。

当然，这里决不排除民族融合。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始终是帝国文明交往过程中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

其次是地缘因素。每一个帝国都是以自己国家为核心来展开与外界接触与交往的。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必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形态、民族心理、社会制度等各方面比较接近的地区。正是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帝国交往的文化圈或文明区。

地缘因素和帝国的文明交往特性密切相关。它常常是一个地区内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的指数根源。环境和谋生手段的相异性，导致帝国主导民族的外部 and 内部关系的多样化交往模式。蒙古帝国因为中古时期辽阔草原适宜释放其“马背文化”能量，因而把西伯利亚到匈牙利的宽广地带变成了自己的天下。以海洋地缘因素为生存空间的西方诸帝国，则借助其特有的炮舰优势，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海上力量，使东方屈服西方。



地缘不但与民族关系密切，而且与帝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与文明融合相伴随。各个帝国的异质文明，在相互交接或相互交叉的地区中，经常出现一种文明结合式的历史景观。在东北亚结合部的地区中，就有日俄两帝国的1904年战争，还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东地区从古到今的结合式的历史景观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时时闪烁其间。存在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欧洲东部到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的诸帝国，扮演着世界上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众多主体的历史角色。

再次是宗教因素。宗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文明的核心，也是帝国文明的基础。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或近似宗教的文明。帝国的文明交往，无论是内部或外部的交往，都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的政治归属感。

在古代帝国的文明交往中，宗教即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移植、生根。起源于西亚的基督教的西传，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全欧洲社会的精神支配力量而影响各西方帝国。印度的佛教也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帝国把伊斯兰教传遍中亚、西非和北非，后来又进入南亚、东南亚和东南欧，形成了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并立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个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文明体系，它也传遍东亚和东南亚，在朝鲜、日本、越南的地位，影响特别巨大。



宗教在帝国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冲突和融合始终相伴。劝人为善、博爱、和平等种种教义，导致宽容与和睦相处。但不同宗教对世界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宗教一旦与民族、集团的利益相结合时，蕴藏的异己力量的巨大差异性就会爆发出来。从 11 世纪欧洲各帝国开始进行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直到 1272 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开始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这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宗教冲突，是最典型的例子。宗教之所以成为冲突的重要因子，是因为它与地缘、文化、习惯、生活方式、资源的天然联系，并以神灵形式“武装”着不同民族。科学和真理在宗教气氛浓烈地区都无能为力。各个帝国之间的对抗，也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子。安瓦尔·萨达特在《阿拉伯统一的历史》中说，东西方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对“神”的理解上，只要这种理解没有对人的信仰、道德、美学等人文意义上进行的真正宗教启蒙，冲突和融合都将继续下去。

从交往哲学上讲，宗教冲突源于将己方奉为主体，将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客体的“主—客”式的交往观。殖民帝国把这种交往观奉为对外扩张和统治的信条。他们将基督教文明奉为惟一文明。把西方现代化奉为惟一的现代化模式，将被征服的对象统统视为“野蛮人”。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全球交往观，盛行了几百年，至今余孽仍存。

复次是语言因素。语言像工具制造与火的使用一